

苏轼的应试之路

◆ 方笑一

分之一六二(即万分之一百六十二),这样一对照,就知道苏轼这回进士有多难考了。

省试

嘉祐元年三月,苏洵带着两个儿子,辞别了妻子程氏,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。大约在五六月间,终于抵达汴京。苏轼兄弟需要在这一年秋天应开封府的发解试。

一个宋代的读书人,如果要考进士,需要通过三级考试。初级就是发解试,由诸州府、国子监、开封府举行。只有通过了发解试,才能参加中级考试——省试。最后则需要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高级考试——殿试。苏轼兄弟进京,就是为了参加开封府的发解试。结果,苏轼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,苏辙也考上了。等待他们的,将是第二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的省试。

省试的“省”,并不是我们今天行政区划的省,而是指尚书省,因为省试由礼部主持,礼部属于尚书省,所以叫作省试。因为省试在春天举行,所以又叫“春试”或“春闱”。省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,这一年的省试,在正月就确定了各位考官,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,副考官是王珪、梅挚、韩绛和范镇。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梅尧臣,这次充任点检试卷官。

苏轼考卷考什么呢?真是不太简单。主要有六项:赋、诗、策、论、帖经、墨义。诗和赋都是押韵的,而且有严格的要求,唐代就是如此。策和论相当于今天的议论文,是不押韵的散文。策的题目一般偏重于时政,而论的题目偏重于历史。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,把经书的一段文字中间贴去几个字,看考生是否填得对。而墨义相当于简答题,答案也是出自经书里的内容,是固定的。综合起来看,诗、赋、策、论的写作,考生是有自由发挥余地的。而帖经、墨义两项,主要考查考生对经书内容是否记忆准确,靠的是死记硬背的功夫。

苏轼虽有天才,但也不是每一项都得心应手的。据说,他的赋就考得不太好,诗应该问题不大。这一年,论的题目叫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“刑赏忠厚之至”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伪孔安国的注文:“刑疑从轻,赏疑从重,忠厚之至。”这个观点,显然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。但要就这个话题写一篇议论文,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首先,你得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其次,你还得知道它的出处。最关键的,考生得有自己的见解,还要将这些见解变作一篇好文章。

苏轼一挥而就。这堪称是改变苏轼命运的一篇文章。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看了文章之后,认为写得非常好,但宋代科举考试试卷是“糊名”,而且要派人“誊录”,这样考官不知道考生的姓名,也认不出考生的笔迹。欧阳修当然看不到苏轼的名字,所以他就认为这么好的一篇文章,肯定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写的。曾巩师从欧阳修,文章风格也模仿欧阳修,又善于写论,这一年也参加省试。但大家都知道曾巩是自己的学生,假如他名列第一,影响不太好,好像欧阳修在刻意照顾自己学生,就故意把苏轼的文章放在了第二名,第一名另外放了一个人,叫李寯。结果揭晓,原来第二名不是曾巩,是苏轼。这就让欧阳修对苏轼更加刮目相看了。

关于苏轼这篇应试文章,还有一件趣事。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里举了一个上古的故事。有一次,要处死一名罪犯,掌管刑法的大臣皋陶说:“把这个罪犯杀了吧。”说了很多次。尧说:“饶了他吧!”也说了很多次。这个故事涉及尧和皋陶,这两个人物经常在《尚书》里出现,放在文章里特别合适。但考官梅尧臣记得不是出自哪本古书了,隐约觉得像是出自《孟子》,去问欧阳修,欧阳修也想不起来。但文章确实写得好,又怀疑是曾巩的卷子,就列为第二。事后问苏轼,苏轼

说:“这故事是我想当然的,何必需要出处呢!”这件小事被宋代好几本笔记记载下来,各家的说法也稍微有些不同,但大体如此,说明了什么呢?

照理,应试所写的论,其中的例子当然应该有出处。就像我们今天参加高考写作文,如果是一篇议论文,所举的事实论据至少应该是一个事实,而不能虚构出来,何况虚构的故事中人物还都是确有其人的。但苏轼就敢于这么做。他有很丰富的文学想象力,能够把这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讲得跟真的一样,而且居然能瞒过欧阳修、梅尧臣的法眼。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,苏轼非但有“文才”,还有“文胆”。

现在不少大学中文系都有个专业叫“创意写作”,我每次看到这个名称,都会想起苏轼在省试时关于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这个故事。可以说,苏轼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成功实践了“创意写作”这样一个理念。

殿试

苏轼最终获得了省试第二名。但他还有一关要过,就是接下来的殿试。

殿试是宋代科举考试中层级最高的考试,因为在殿廷举行,所以又叫“廷试”。殿试的考官是宋仁宗本人。正因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,所以又叫“亲试”或“御试”。嘉祐二年(1057年)的殿试在三月举行,地点在崇政殿。

殿试有一道题,叫考生写一篇论,论题是《重巽以申命》。这个题目出自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有六十四卦,里面有一个巽卦。巽就是谦卑、和顺的意思,象征风。这句话出自巽卦的《象传》。《周易》中除了“经”的部分,还有十篇《易传》,《象传》就属于《易传》,它解释巽卦:巽巽下合起来,就是上下和顺,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非常谦卑,君上对于下面的臣子也非常宽容,上下和顺,命令就可以通行无阻了,这就是“重巽以申命”。这个道理当然不错,可以文章来解释未免枯燥,容易缺乏形象性。苏轼很聪明,他抓住了巽象征风的意象。他说:风遍布于天地之间,它的威力很大,你却看不到它的形态,不知它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。大风在山岗上吹拂,微风钻入洞穴草屋之中,树被风连根拔起,但是你看不到风。风可以使万物成长、化育,天并不把功劳记在风的身上;风也摧毁草木,但是天也不会怪罪于风。所以圣人下命令的时候,要影响大家于无形,让别人心甘情愿接受,不能硬性推行。

这还是儒家的思想。不过在文法上,显然有《庄子》的影子,把风的威力写得很生动具体,富有想象力。

前面说过,这次参加进士殿试的考生总共有388名,按照当时的惯例,这些考生在殿试中不黜落,就是不淘汰,都可以说是进士,但要排一个名次。第一名也就是状元,叫章衡。苏轼没有进入前三甲,他中的是“乙科”,名次是第六名。原来,苏轼获得省试第二名之后,那些写险怪文章成绩不佳的人攻击辱骂欧阳修,要出一口气。受到舆论压力,朝廷就把他放在第六。这个名次虽然在乙科,但也是非常高的。苏辙也取得了好名次。殿试之后,宋仁宗回到后宫对皇后说:“这次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。”可见对苏轼兄弟印象深刻,评价是非常高的。欧阳修则说,自这次考试之后,苏氏父子三人“名动京师”,他们的文章真正开始名扬天下了。

制科

可惜的是,嘉祐二年四月,苏轼兄弟的母亲程氏去世了。兄弟俩就回眉山守丧去了。十一月,苏氏父子在家乡安葬了程氏夫人。嘉祐四年(1059年),父子三人又再到京城。朝廷授予苏轼福昌县主簿,苏辙涪池县

主簿,他们都没有就任。因为,他们在为进士之后的下一次重要考试做准备,这就是制科。

制科又叫制举,它区别于进士考试这样的“常科”。进士三年考一次,有固定的时间,而制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下诏决定的考试,选拔专门的人才。当时,制科考试分为三个步骤。

第一步,苏轼、苏辙各献上五十篇文章,其中二十五篇是策,二十五篇是论。一般而言,策偏重于讨论时务,而论偏重于讨论经史。这五十篇文章是他们事先写好的,进呈朝廷,有人举荐当然更好。苏轼兄弟就分别获得了礼部侍郎欧阳修和中书舍人杨敞的举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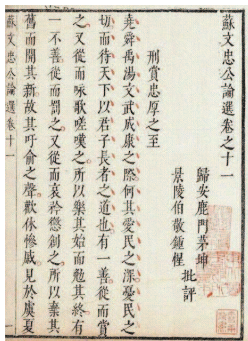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步,需要在秘阁参加考试,根据题目,写六篇论。嘉祐六年(1061年)八月,兄弟俩参加了秘阁的考试,考官是吴奎、杨敞、王畴、王安石等。秘阁是宫廷收藏书籍和书画的地方,这六篇题目分别是《王者不治夷狄》《礼义信足以成德》《刘恺丁鸿孰贤》《礼以养人为本》《既醉百福》《形势不如德》。写这些文章,难度不小,首先你得知道题目出自哪里,比如“王者不治夷狄”,出自《春秋公羊传》的何休注,“礼义信足以成德”出自何晏《论语集解》中汉代包咸的注。另外,历史人物的事迹也需要了解,比如刘恺、丁鸿都是东汉人,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,是因为他们都把封爵让给自己的弟弟,但丁鸿最后还是听从朋友劝说,回去就国,没有让爵。苏轼就说,封地又不是你自己的,是你的先人传下来的,哪能说让就让呢?而且随便让出去,也破坏了先王防止内乱的法度,这本来就不是你一家私事。从苏轼的文章来看,他基本熟悉题目的典故,又能从古人的解释中阐发出自己的新意义。到了秘阁考试这一关,能通过的人就寥寥无几了。这一次,通过的只有苏轼、苏辙、王介三人。

第三步,要接受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,就是御试。御试的考官是胡宿、沈遵、范镇、司马光、蔡襄。考题是一道策问,考生必须写一篇对策来回答。策问是皇帝向大臣征询治理国家方略的一种形式,后来演变成为一种考试方式。策问和对策一般比较长,策问中包含几个问题,考生在写对策的时候需要逐一阐述解答。苏轼兄弟拿到的这一道策问有六百多字,其中讲到仁宗统治以来,国家还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,而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,这些灾害都和国家治理不善有关。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?还有些问题涉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看法。比如,汉文帝崇尚老子,天下富足,而汉武帝提倡儒术,反而是海内虚耗,这是为什么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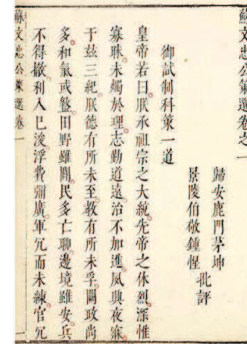
苏轼在对策中回答说,汉文帝崇尚老子是有过失的,问题恰恰在于他稍微使用了一下儒术,但不彻底;而汉武帝也不能说是提倡儒术的君王,因为他延请方士,大兴妖祠,大造宫室,这些都不是儒家所提倡的。所以汉文帝时代的富足并不是因为他崇尚老子,汉武帝时代的虚耗也不是因为他提倡儒术。苏轼的这篇《御试制科策》近6000字,紧扣住皇帝的问题来回答和分析,可谓考场雄文。

御试是制科最终确定名次的考试,一锤定音,苏轼取得了最好的成绩“入三等”。按照惯例,宋代制科御试成绩分为五等,但一、二等都是虚置的,从来不把考生的成绩打到第一、二等,最好的成绩就是三等,所以三等其实就相当于一等了。苏轼之前,宋代“入三等”的只有一个人,叫吴育,在苏轼之后,入三等的还有两个人,叫范百禄和孔文仲(后取消)。也就是说,整个宋代,制科入三等的总共就四个人。这一下苏轼真正显示了他的实力,又一次引起极大的关注。而苏辙因为在对策里直言朝廷的得失,评定成绩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些争议,考官之一的司马光竭力主张评为三等,但最后还是和王介一起,被列为四等。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好的。

之后,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(今陕西宝鸡)判官,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(今陕西商洛)军事推官。但苏辙要侍奉父亲苏洵,没有去就任。苏轼则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。



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明刻本《苏文忠公策论选》



苏轼《御试制科策》